

## 資訊社會與弱勢群體的文化公民權： 以台灣遊民另類媒體的崛起為例

戴瑜慧、郭盈靖\*

---

投稿日期：101年1月16日；通過日期：101年4月16日。

\* 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e-mail: Tai.yuhui@gmail.com；郭盈靖為財團法人基督教救世軍社工，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執行委員，e-mail: ecje2000@yahoo.com.tw。

## 《摘要》

本文旨在檢視資訊社會與弱勢群體文化公民權之間的辯證關係。首先，伴隨資訊社會發展而生的數位落差與資訊商品化現象，對無固定住所的城市貧民造成新的雙重壓迫。在既有的社經弱勢外，遊民遭受新的貧窮剝奪而成「資訊窮人」，同時在媒體的煽色腥取向下物化為刺激收視的「汙名化商品」。然而，當前數位落差政策，僅以家戶網路普及率為指標，形同對無家戶者的系統性排除並使其成為不見於政策的隱形資訊窮人。日益加深的結構性壓迫、資訊科技使用門檻的降低以及公民新聞的提倡，亦辯證性地提供新的反抗空間，促成台灣遊民另類媒體崛起。本文以漂泊新聞網為個案分析，檢視崛起的背景成因、發展形式、組織型態以及面臨的結構性限制。研究結果指出，若要克服數位落差則須改變既有以普及硬體設備為目標的科技決定論，改為著重以人為本協助草根社團發展，以積極的方式促進弱勢群體使用資訊科技，同時具體改變弱勢者的社經處境，方能消除科技隔離，釋放弱勢者參與的潛能。

關鍵字：公民新聞、公民權、另類媒體、遊民、資訊社會、數位落差

## 壹、前言

無固定居所（Homelessness）儘管是歷史久遠的一種生活處境，卻特別是在 18 世紀人類社會自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經濟過渡，迫使大量的人群離開土地後，而成爲越發顯著的社會現象（Levinson & Ross, 2007）。由於無固定居所的型態，深刻的被捲入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要理解無固定居所在各個國家社會的情況，都必須將其放置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脈絡下進行歷史性的考察，方能理解無固定居所這一當代社會最尖銳顯著的社會矛盾。

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皆有無固定住所的現象，然以伸張無固定住所者權益的遊民另類媒體卻爲近年新的發展。本文作者將以研究者與實踐者的雙重身分，回顧探討台灣另類遊民媒體於 2007 年崛起的發展經驗，而此項研究又必須放置在全球資訊資本主義發展、資訊社會論述風行與數位落差政策的脈絡下考察。特別是自 1996 年開始，台灣政府將推進資訊社會列爲重要政策，但擴大的資訊商品化進程卻深化遊民遭受的結構性壓迫，並將遊民貶抑爲兩種主要身分：一爲資訊窮人（information poor），另一爲汙名化商品（stigmatized commodity）。

第二節將分析資訊社會下遊民所面對的數位落差困境，以及台灣資訊發展政策對遊民的系統性忽視與排除，使其資訊窮人的身分不被正視。第三節透過分析遊民的新聞再現，指出透過犯罪類型及慈善類型兩大報導型態，主流媒體將遊民建構爲「汙名化的商品」，刺激收視，深化社會對遊民的刻板印象。第四節將分析社會對遊民的歧視，造成雙重認同危機—遊民無法認同自身，以及社會無法認同遊民。第五節回顧介紹遊民另類媒體崛起的歷史背景。2007 年成立的遊民新聞討論小組以

及主流媒體大篇幅的汙名化報導，催生出遊民自我發聲的動機與需要。第六節，以 2007 年成立的漂泊新聞網為例，指出資訊科技如何在造成新的壓迫關係之外，亦辯證的提供新型的反抗可能。但資訊硬體不足以作為充份發展另類媒體的條件，必須有在地的，植根於弱勢群體生活網絡的「草根社團」（Grassroots network community），透過組織行動的方式，幫助弱勢者克服數位落差，方能成為有機的文化行動者。

## 貳、數位落差與資訊窮人

資訊社會一詞的流行，使曾經當紅一時的後現代、後殖民和後福特主義論述相形褪色，一躍為描述當代社會的主導論述之一。儘管資訊社會論述可否做為精確的社會分析工具猶在激烈爭辯之列（Carey & Quirk, 1989; May, 2002），但在理論之外，它卻已被政策制定者、官僚與國際媒體廣泛擁抱，而成為具有真實國家政策影響力的支配性概念。誠如 Boyle（1996）所指，假如人們選擇相信資訊社會的論述，就能以「資訊社會」來自我定義。

在關於資訊社會論述的討論中，如何看待資訊社會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是核心的討論議題，基本上可以區分為三種觀點。第一類觀點對資訊社會抱持樂觀態度，認為將推動社會朝向正面發展。資訊科技將推動經濟發展，同時幫助人們獲取資訊，提升自我表達的能力以及促成政治與文化參與（Feather, 1998; Leadbeater, 1997）。第二類觀點強調科技的中立角色，認為「科技就是科技；它僅是促進跨越時空的傳播與傳輸工具，此外，別無再有」（Carey & Quirk, 1989, p. 140）。第三類觀點，則對資訊社會對社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抱持擔憂審慎的態度，例如是否將造成監控的擴大濫用（surveillance）、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以及深化全球資本主義下的資訊商品化 (information commodification) 。Mestrovic (1994) 的研究主張資訊商品化業已導致政治、經濟與文化均納入全球整合與控制範圍，而 Mosco (1994) 則關切企業壟斷 (corporate monopoly) 如何透過資訊科技的控制而日益增強，以及社會應該如何破除企業壟斷，提供所有人群都可以使用資訊科技的普及服務 (universal service)，以維持公共領域的健康發展。

簡言之，資訊社會論述的被創造、擴散以及成為國家政策推動依據，都持續推動資訊的商品化過程與擴大資訊科技在社會的影響力，造成資訊環境發生變化 (Ronald, 1995) 。May (2002) 指出：

在崛起的資訊年代裡，資訊成為企業家的重點投資投入，如何對資訊進行控制成為首要關切。這同時意味著必須首先阻斷資訊的自由流通，然後才能施加控制，也正是在這個對知識進行控制、掌握、阻斷自由流通的意義上，我們稱此為一個新的時代 (p.5) 。

Feather (1998, p. 114) 指出在這個崛起的資訊社會裡，最重要的政治議題即為「不管可能帶來的利益為何，究竟是誰獲得資訊？而誰又被排除在外？」。

是此，1995 年之後，關切資訊科技的使用與排除的數位落差成為重要研究議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的定義，數位落差是指存在於個人、家戶、企業在不同社經背景或居住地理區位上，其接近使用資訊科技及運用網際網路所參與的各項活動的機會差距。亦即資訊科技的使用並非存在社會真空，社會成員的收入、教育水平、性別、年齡、工作、族群、家戶型態等因素都影響其資訊科技使用的能力 (Steyaert & Gould, 2009) 。位於政治經濟優勢的社會成員，也相對擁有較優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及知識，使得資訊富人 (information-rich) 和資訊窮人

(information-poor) 的鴻溝持續拉大。

在資訊時代裡，資訊成爲重要的社會資源，關係到受教機會、工作的選擇獲取，甚至攸關健康照護，因此 Steyaert & Gould (2009) 指出數位落差應被列爲社會排除的一種型態，成爲與教育、工作、健康照顧一樣重要的公民基本生活權利。同時，數位落差與其他型態的社會排除之間，往往具有相互強化的關係。也因此目前的資訊窮人，大多爲原本即遭受到某種社會排除的弱勢群體，例如失業者、偏遠地區居民、文盲、殘障者、新移民和語言能力弱者 (Ronald, 1995)。

無固定居所者，是一群遭受嚴重社會排除的弱勢群體，除了經濟困境外，也被烙上深重的社會標籤，往往被視爲對立於正常市民之外的不正常他者。因此，要考察遊民如何成爲資訊窮人，必須同時考察其社經狀況及遭逢的社會歧視。根據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在 2010 年 (台灣當代漂泊協會, 2011 年 1 月 24 日) 針對台北車站遊民做的調查，由於社會結構的變遷，台灣的遊民組成除了老弱殘疾失卻工作能力者，在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勞動彈性化快速增長趨勢下，工作所得過於微薄，以致於無法負擔棲身之地的的工作窮人也成爲遊民高風險群。

根據調查，高達七成以上的遊民是勞動者 (71.4%)，但工作高度不穩定，打零工比例高居首位 (68.6%)。工作類型，包括舉牌工作 (47.1%)、出陣頭 (40%)、工地粗工 (27.1%)、清潔工 (17.1%)、廚房雜工 (9.3%) 等。因爲不穩定與低薪資的特性，使其收入所得非常的低，高達 82.2% 的遊民過去三個月內每月工作收入低於 5000 元，其中 67.9% 遊民每月工作收入少於 3000 元 (台灣當代漂泊協會, 2011 年 1 月 24 日)。

由於收入微薄，使其生活陷於貧困，連基本飽食都成問題。調查遊民用餐狀況發現，46.4% 一天吃兩餐，30.7% 一天吃一餐，能夠正常吃

三餐的僅占 13.6%，甚至仍有 9.3% 的遊民經常沒有用餐。明顯看到遊民經常處在有一餐沒一餐的飢餓狀態。由於收入過低，遊民基本上過著赤貧的生活。問到每月收入這麼低，日子要怎麼過？

遊民阿超說，「你應該很難想像自己身無分文，要怎麼過日子吧？但是，我常常都是這樣。口袋空空，一毛錢都沒有。常常就剩幾個銅板，叮叮噹噹的在口袋裡，這些銅板是要拿來打電話問工作的。做臨時工，工作不是每天有，你就需要打電話問老闆有沒有事頭。口袋只剩幾塊錢，或是口袋空空，要怎麼辦？肚子餓，又沒東西吃，就讓他餓。真的受不了了，你又真的沒東西吃，那怎麼辦，就是猛喝水。喝飽了，就不會餓了」（台灣當代漂泊協會，2011 年 1 月 24 日）。

由於資訊的商品化，使得金錢成為獲得資訊的必要條件，也因此阻礙遊民的資訊獲得。一份報紙的價格約為台幣 10 元到 15 元，在一般社會標準中，是低價格的商品。但是對於身無分文的貧窮者而言，卻不一定可以負擔。2007 年 9 月 28 日，台灣一位周姓遊民，就是因為希望看到洋基隊投手王建民的資訊，在超商偷了一份報紙，而被超商老闆用球棒毆打致死（項程鎮，2010 年 9 月 25 日）。

棒球在台灣向具有重要的社會、政治與國族意義，因此王建民被稱為「台灣之光」，而陳水扁在國慶演說時，更拿出王建民的簽名球與照片，強調「台灣加油」的精神。上至總統，下至媒體，全面推波助瀾形成一股「王建民熱」，媒體持續不斷的將各式關於王建民的資訊向社會傳送，而社會大眾在熱潮中被鼓勵消費更多關於王建民的新聞，做為愛國家，參與國家群體榮光的表現。在這樣的資訊瘋狂推動熱潮中，周先生做為市民的一份子，被召喚鼓勵參與這股「王建民熱」。然而遊民周先生卻因貧窮無法購買報紙，而被排除在王建民熱潮之外。在社會整體推波助瀾下，王建民熱已不只是資訊、娛樂，更牽涉社會參與、自我滿

足與國家認同。因此，貧窮者因無法購買資訊商品而成爲資訊窮人，除了缺乏社會生活所需資訊之外，也面臨更深刻的社會排除與邊緣的社會位置。

然而目前技術中心（*techno-centric*）或經濟利益（*economic-driven*）主導的數位落差政策（Tsatsou, 2011），不僅無法改變數位落差造成的社會不公，更成爲掩飾數位落差的欺騙性論述（Siobhan, 2009），特別是透過分析無固定住所者在數位落差政策下的處境，更暴露當前政策的盲點與限制。

當前數位落差的研究最主要的缺失是將其窄化爲少部分人群特有的問題。依照人口學變項如性別、收入、地區、年紀等，圈劃出所謂的資訊窮人，並針對這些人群提供網路的近用與使用（Rice, 2002）。是此，目前各國政策紛以提高網路的家戶普及率（*universal access*）做爲指標。例如英國首相布萊爾（Blair, 2004, 09, 28），在 2004 年宣稱要終結數位落差，目標爲 2008 年讓每個家戶都能上網。台灣政府則在 1996 年成立「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案推動小組」（NII），將目標設定爲「3 年 300 萬人上網」。陳水扁任職台北市長時，提出「校校有網路，班班有電腦」（季欣麟，1998），並在 2002 年「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提出數位台灣計畫，目標爲「6 年 600 萬戶寬頻到家」。2008 年馬英九總統在「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設計畫（98-101 年）」提出「智慧台灣」計畫，2010 年行政院長吳敦義在院會中指出發展有成，已有 85% 家戶連網，同時指示須注意偏遠地區，弱勢族群與婦女的數位落差問題（行政院，2010 年 11 月 25 日）。

然而這種將硬體提供視爲解決手段，以提高家戶網路普及率作爲目標的政策，看似科學與效率管理，實則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將其粉飾爲僅關乎少數個人的技術性問題（Bruno, Esposito, Genovese, &



Gwebu, 2011; Gillett, 2000; Parayil, 2005; Siobhan, 2009; Tsatsou, 2011)。同時，調查方式以家戶為單位，等同排除了沒有家戶的人從而隱藏了實際數位落差的程度。如無固定居所者之資訊使用情況或是資訊貧窮處境該如何改善，因被統計排除在外而也從未被政策提及，成為集體被隱形的資訊窮人，是「數位台灣」或「智慧台灣」島嶼上的化外之民。

第二，硬體導向的政策以讓所有的人民有機會使用電腦與網路為目的。解決手段通常有二，一是透過公共圖書館；二是鼓勵企業贊助或由政府採購新舊電腦和經費補助讓部分人民（例如貧困學童或偏鄉居民）得以上網。Siobhan（2009）批評此種政策實則充斥新自由主義標榜的個人主義精神，將責任再度推回個人。無法在新經濟大海中弄潮的人們，在一個只要有意願都可以使用網路的社會，跟不上資訊社會肯定是個人的問題。

既有政策下，無固定住所者因不在政府的家戶視角內，其網路使用除倚賴公共設施（例如公共圖書館）與社福機構外，大抵剩下商業網咖，但這三種地方卻都不是友善使用的空間。美國研究指出遊民的網路使用率非常的低，主要原因包括前往公共圖書館的交通問題、缺乏使用網路的技術以及使用環境缺乏隱私性（Gaved & Mulholland, 2010）。社福團體則因資金問題與不想面對遊民上網帶來的管理問題，而幾乎不願意提供網路設施（Hersberger, 2005）。

台灣的遊民在使用網路上也往往面臨多重障礙，包括交通問題、交通費用、開放時間限制以及缺乏隱私的環境。唯一能夠享有隱私空間，自由使用電腦的場所，只有商業網咖。網咖近年來價格下降，一日 100 元左右的價格，也成為無固定住所者的暫棲之地，繼日本之後，在台灣浮現網咖難民的新現象。然而目前網咖的環境相當不適合休息睡眠，不

流通的空氣、長時間坐著上網以及吵雜的環境，對以此為家的網咖難民而言，長此以往將造成嚴重的健康損害。台灣當代漂泊協會遊民攝影班的成員阿寶，即因左腿骨折進入收容所休養。但不堪收容所要求休養後，需要外出找工作的壓力，<sup>1</sup>再度離開，最後在 2012 年 4 月於網咖昏倒，腦部大量出血，自此失去意識。

許多學者指出數位落差的議題不應侷限於近用與使用，其他因素如使用能力、知識、技術、獲得的支持與社會文化環境等都必須一同考量（Livingstone, 2007; Mansell & Steinmueller, 2000; van Dijk, 1999）。甚至，數位落差本身就不應該與其他社會議題如收入差距拉大、產業結構變化等分割看待，因為這些現象並非互無關係，而都是資訊資本主義不同面貌的展現（Parayil, 2005）。甚至更須放在宏觀的歷史長流中考察，透過對封建社會、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以及資訊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轉型進行比較，Parayil（2005）指出當前的資訊資本主義社會其社會成員之間的差距，甚至比封建社會還要劇烈。當代的智慧財產權則相當於封建時代的地租，是掌權者尋租活動的表現（rent-seeking）。

在新封建時代，今日的遊民宛如昔年賤民，僅因其身分烙印，而橫遭輕視、鄙棄、仇恨犯罪、社會隔離，甚至剝奪一般人民皆可自由使用的物品、空間或資訊。相對一般市民可以自由停留公園，遊民卻被視為妨害干擾，時遭通報驅趕。資訊社會下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難以脫離資訊科技，但遊民的資訊科技使用需求卻被漠視，認為其生存層次僅在維持存活最低限度，有麵包衣服就足夠，無須使用資訊科技。即使接觸遊民經驗豐富的社福機構也充斥類似偏見，認定遊民所需資訊侷限在尋找住所、工作、金錢，藥物成癮或家庭暴力等，這些資訊透過社工，政府或親友等人際網路就可獲得，網路對遊民而言是不需要的奢侈品（Gaved & Mulholland, 2010）。

針對過往技術中心論的偏狹，Servon（2002）強調數位落差的研究必須提出新的框架與拓展更廣泛的解決途徑，否則就算有普遍近用的網路，也不會帶來社會變遷。例如 Howard, Busch & Sheets（2010）就主張需發展不同的政策方向，透過比較美國與加拿大的數位落差政策，指出若只關注硬體設備如美國，是無法改善狀況。必須如加拿大同時進行公共資訊教育以及投入文化產品的生產才有可能減緩數位落差。除了強調公共教育與文化生產的角色之外，透過社區的互動協助，也是新的關注焦點。Wong, Fung, Law, Lam & Lee（2009）針對香港數位落差政策的研究指出既有硬體為主的政策往往效用有限，沒有後續的維修、指導與發展適合弱勢者的軟體內容，電腦多淪為閒置的擺設。作者認為透過建立當地的社區支持系統，方能讓使用者能夠便利且即時的解決困難與發展長期使用的興趣。

此外，過往偏重人口學變項的研究，在標舉出資訊窮人之外，也有可能缺乏鉅觀社會經濟脈絡與細緻的文化察考下，反而加深這些弱勢群體的刻板標籤。Hilbert（2011）針對開發中國家婦女的研究就指出婦女並非不想親近資訊科技，在提供親近使用的條件下，長期以來將能藉此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結構。Khan & Ghadially（2010）針對弱勢族群少女的研究也指出，少女的資訊科技應用未必低於男性，甚至成為少女們逃逸嚴密文化規範的工具與闖出主體建立的空間。除了反思既有研究強調對「受害」弱勢群體的指認，上述這些研究也強調資訊科技的辯證性與人類的能動性，探討資訊窮人如何運用資訊科技賦權，伸張文化公民權，以及參與打造民主機制的的能力。

沿襲當前數位落差研究的發展，本研究強調深入使用者的生活脈絡與文化慣習與長時間進行田野考察的必要性。同時亦關注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辯證動態的看待使用者與資訊科技使用之間的限制與賦權

可能。

## 參、資訊商品化下的汙名化商品 (stigmatized commodity)

針對遊民群體在主流媒體的再現研究 (Kendall, 2005; Lind & Danowski, 1999; McNulty, 1992; Tipple & Speak, 2009)，曾經發現遊民的被高度汙名化，如 Tipple & Speak (2009) 即指出儘管與實證調查不符，但遊民被貼上的標籤卻包括：罪犯、精神病患、不道德之人、四處遊蕩的人、孤獨的人、市民的威脅，以及無藥可救的人。

這些汙名化的標籤，使得遊民遭受嚴重的社會排除，被視為外在於正常社會體系的化外之民、對立於正常市民之外的他者，甚至被物化貶抑為供人觀看、評論以及嘲弄的客體 (Kendall, 2005)。這些標籤的建立以及烙印，往往是透過主流媒體的報導建構而成，特別是集中在兩大類型的遊民報導，一種是犯罪相關報導，另一種是假日慈善報導 (Kendall, 2005; Tipple & Speak, 2009)。這些報導強化社會對遊民的刻板印象，並烙上歧視的社會標籤，例如酗酒、精神病、懶惰、危險與悲慘。亦即在資訊商品化下，遊民不僅做為「資訊窮人」失去平等近用資訊的權利，更被物化為聳動的「汙名化商品」，被觀看、評論、嘲弄以利媒體刺激收視，部分政治人物與社會團體則利用此「汙名化商品」具有的收視效應，主動操作遊民報導，博取媒體版面進行造勢募款。

在主流媒體之外，2010 年 4 月 1 日，以遊民做為銷售通路的《大誌雜誌》獲得英國授權後於台灣創刊。根據其網站所指的定位，這是「一本屬於愚人世代的雜誌。這是一本給流浪在街頭的人們所販售的刊物。透過一個可以自食其力的機會，掌握生活主導權」 (<http://www.bigissue.tw>)。

這份雜誌與遊民的連結主要集中在宣傳與發行，而非在刊物內容。對此，創辦人李取中解釋「通路與內容無關，對我來講這就是雜誌，與透過什麼通路無關」（陳明輝，2010，頁 87）。

刊物主要訴求族群以人數約 600 萬到 700 萬，介於 20 到 35 歲的 Y 世代為主。從各期主題觀之，內容聚焦在明星（桂綸鎂、強尼戴普、娜塔莉波曼等）、歌星（阿妹、陳綺貞、盧廣仲等）、科技、時尚、設計、文化遊記、表演藝術與各項藝文活動等。在 2010 年 4 月到 2012 年 1 月總共 22 期的雜誌中，遊民議題相關的報導，僅在每期最後刊登「本月之人（販售者）」訪問。訪問內容以這些遊民販售員加入販售隊伍後的經驗心得為主，透過類似證言廣告的方式，再次強調雜誌是遊民幫助者的正面形象。

由於《大誌雜誌》強調內容與發行不同，儘管發行員為遊民以及在宣傳訴求上以幫助遊民為主，但刊物內容並未對遊民或城市貧民等社會議題直接碰觸，因此台灣關於遊民議題的呈現，尚以主流商業媒體以及 2007 年之後出現的遊民另類媒體為主。在主流商業媒體的部分，其報導類型主要集中在「犯罪類型報導」以及「假日慈善報導」，其報導方式與型態分析如下。

## 一、犯罪類型報導：公共空間的危險物與犯罪嫌疑人

「台灣省遊民收容輔導辦法」對於遊民的定義，遊民係指「流浪、流落街頭孤苦無依或於公共場所棲宿、行乞必須收容輔導者」。流浪、流落或露宿於公園、車站、街道等公共場所，曝露於外的身形、行為，成為社會辨識遊民的方式。Wright (1997, p. 1) 指出，「遊民外顯的身體、舉止和出現，取代無形抽象的貧困，成為社會關注焦點」。因此遊

民的身體往往成爲遊民新聞再現中的焦點，主流媒體的遊民報導，往往集中於其衣衫襤褸，帶著家當，坐躺街頭的樣態。

遊民的身體也因屢被特殊化、妖魔化而常被視爲具有危險性的象徵，以致在公共空間亦被標誌爲「危險區域」般地須有公權力介入處理。犯罪類型報導當中的一大主題，就是遊民「侵入」公共空間，例如公園、街道、車站等處，造成區域的危險不安，引發市民反彈，最後以市民要求公部門介入處理作爲新聞事件的結束，如下二例（郭盈靖，2009）：

長期被詬病的新竹市建國公園，改善完工後，市長林政則昨天上午驗收成果，不少市民反映整體環境比以前清爽舒適，不過仍有人大刺刺占椅睡大覺。百歲人瑞楊龍街當場向林政則建議，公園內還是常見到遊民躺在椅子上睡覺，妨礙觀瞻、令人不安，林政則允諾改善（聯合報，2007.10.26: C1）。

鐵路警察局這兩天勸導和驅離盤踞車站內的遊民，並且用手推車逐「戶」收走遊民佔位子和棲身的紙板，但因不足、又欠缺完整配套措施，效果不彰，鐵路警察局長于建中說，因為天氣熱，站內有免費的冷氣吹，一度多達 200 人聚集，目前站內也還有 50 多名街友，「盛況空前」。今年夏天以來，站內雖未發生重大案件，但不少旅客看到睡得東倒西歪的街友，心裡難免「怕怕」（聯合晚報，2007.08.12: 5）。

儘管遊民所處的空間爲公共空間，其行爲如報導中所指並未觸法，但因其被標誌爲非正常者，危險份子，儘管未有傷人擾民的行爲，媒體報導中仍突顯其對市民的威脅性，「心裡難免『怕怕』」、「令人不安」。

遊民也就在被標誌為社會的他者，而被排除其使用社會公共空間的權利，露宿街頭被稱為「占據」、「盤踞」。因此驅趕、勸離遊民就成為維持社會正常運作之必須手段。在此新聞論述中，市民被二分為「正常市民」與「不正常市民」，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對立衝突的，遊民是市民的安全威脅者。因此「正常市民」檢舉「不正常市民」（遊民），要求國家權力機關介入，驅趕不正常市民（遊民）。在市民要求國家機關介入的同時，也將公共空間使用的裁量權，自社會群體讓渡給國家機器，從而正當化國家權力機關對公共空間使用權的獨佔，並將遊民對公共空間的使用就地非法化。

第二種犯罪類型報導大量集中在社會新聞案件，強調遊民是犯罪事件的主要嫌疑人，而遊民待過的地方，將成為治安死角與犯罪溫床，如下二例：

台北市寸土寸金，卻有國宅閒置多年。市議員陳建銘昨天會勘延平北路六段永平國宅，發現該國宅 1 樓空間淪為遊民聚集處所，甚至可見棉被、強力膠、保險套等物，陳建銘抨擊，市府欠缺管理，讓國宅成為「犯罪溫床」（聯合報，2007.11.01: C1）。

埔里鎮明德路林務局舊宿舍區，去年起辦理收回、報廢後，共 21 棟平房宿舍只剩兩戶仍由南投林管處人員配住；入夜後漆黑一片，變成遊民棲身之所，環境更是雜亂，宿舍地板還可見被丟棄的針頭，成為治安死角，附近民眾視為畏途（聯合報，2007.12.05: C2）。

這類新聞報導，時有誇大不實的渲染，即使在無任何犯罪事證指出遊民涉案，依舊可在標題或內文中見到遊民被突顯為犯罪者。Kendall（2005）指出儘管遊民與窮人並未特別涉及自殺、殺人、或其他犯罪，

但過去 150 年的遊民與窮人的報導卻都顯示高度的一致性，將貧窮與越軌行為扣連，強調貧民與其他中上階級的人是多麼不同的異類。仔細檢閱 2007 年 11 月 7 日一則新聞報導，主標題為「金門新城爆遊民性侵女童」。斗大標題，控訴遊民性侵女童的罪行，再次加深社會大眾對於遊民的負面印象。然而，內文所陳：

現場只有最後一棟找到破舊的盥洗用具，沒有發現遊民的棉被或生活用品。幾名婦人告訴林德華，她們沒看見遊民出入，倒是一旁的籃球場有時會有小混混出入，林德華表示會設巡邏箱加強防範（聯合報，2007.11.07: C2）。

亦即附近居民表示未見遊民出入，警方也未找到遊民涉案的證據。然而，新聞標題，卻以聳動確定的說法，直接指出遊民為性侵者，加深社會大眾對於遊民的刻板印象。

## 二、假日慈善報導：遊民是可悲的失敗者與可憐的需救濟者

除了犯罪類型報導，另一種固定的報導類型是每逢假日時節，社會團體、公部門或民眾救濟遊民的慈善新聞。Whang（1993）針對美國遊民報導的研究指出，慈善報導已經成為媒體每到感恩節和耶誕節的例行公事，透過宛如肥皂劇般的煽情報導，引發觀眾的同情心。Kendall（2005）也指出，在假日或是災難期間，媒體傾向挖掘溫馨感人的小故事，也因為容易接近的關係，記者往往會針對窮人或遊民進行報導。有時也是因為非政府組織主動發布新聞資料，希望博得新聞版面擴大募款。

台灣則是在農曆過年時節，就有例行性的遊民慈善報導，其報導價值也在於「過年是家家戶戶團圓日」與「無家可歸、有家歸不得的遊



民」之間的強烈對比，亦即在過年時節，遊民成爲被標舉出來，異於社會其他成員的特殊群體，如下例：

過年是家家戶戶團圓日，此時此刻，無家可歸、有家歸不得的遊民最苦；平日消磨時間的市場、地下室、停車場，紛紛拉下鐵門，好心供餐的民間團體此時放年假去了，入夜後寒風瑟瑟，街頭冷清，找不到容身之地（民生報，2005.02.07: A3）。

Passaro（1996）指出，遊民被稱爲無「家」可歸者（homeless），而非無「居所」者（houseless），此間的稱謂差異，即反映主流異性戀家庭體制對無居所者的價值判斷——認爲他們是核心家庭的越軌者。家庭作爲父權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也是空間與社會組織的規範單位，房屋（house）被等同於家庭（family），而住宅政策被視爲家庭政策的延伸。異於核心家庭之外的無居所者，也就成爲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與父權社會的異己，對立於所有社會成員的他者。在此二元對立結構下，遊民往往被視爲「不正常的他者」，與「正常的市民」之間具有清楚的界線，是對「正常市民」安全生活的威脅。依照過年團圓的習俗，社會所有成員基本回到各個「父之家」、「夫之家」或是「兒子的家」，以維持傳統，過個有秩序有依歸的年節。然而遊民在過年時節，卻成爲社會顯著的不守秩序者，象徵性的破壞團圓圍爐的儀式與挑戰父權家庭的管束威權。

爲了維持家家團圓的傳統儀式，街友尾牙宴騰空安置出一個暫時的家，讓無家者可以在此圍爐，與社會其他成員一樣參與過年的儀式。街友尾牙宴往往是此時期系列報導的高潮，其報導模式與活動類型也呈現高度的一致性，包括遊民人數的每年攀升、主辦單位的籌款困難、底層善心民眾的共襄盛舉、政治人物致贈紅包和受餽遊民的個人故事與感謝話語。在遊民尾牙宴上，政治人物以大家長的姿態蒞臨致詞，發放紅

包。如 2011 年創世街友尾牙宴即由副總統蕭萬長進行開幕致詞，說道「感謝社會各界付出、拜託大家持續關懷弱勢族群、祝福身體健康又快樂」，並同時加發 500 元紅包（李祖翔，2011 年 1 月 27 日）。

遊民尾牙宴的特色之一，是各級政府官員的出席，上自總統、副總統、市長、政府官員、立法委員、議員，甚至地方鄰里長。以大家長的主體姿態致詞，向社會各界表達感謝，如副總統蕭萬長致詞所言，「感謝社會各界付出」、「拜託大家繼續關心」。發起尾牙宴的台中金華里里長蘇福安更製作感謝狀，頒發給曾經是遊民的攤販曾郁喬，謝謝她為蘇福安主辦的尾牙宴的貢獻（馮惠宜，2011 年 1 月 12 日）。政府成為發動感謝的主體，以大家長的姿態代表遊民向外界表達感謝，而遊民在一系列的感謝動作中，是無聲的客體，是家庭隱喻中，那個不成材或不幸孩子的角色，讓父母與外界為之操煩。

幫助籌辦尾牙宴的非政府組織以及捐款的民眾志工，則是促成一夜家庭溫馨的善心人士。除了長年推動的具有知名度的大善人，如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人。另一類善心人士則是眾多的小市民，如攤販、市場老婦人或小額捐贈者。例如 2011 年創世尾牙宴的募款新聞就強調各界的共襄盛舉，「今年六千多人捐款贊助尾牙宴，單筆最大為 123 萬元，最小 50 元，非常感謝善心人士的幫忙」（張勵德、蔡智銘，2011 年 01 月 27 日），這些零零總總來自各方，金額有大有小的捐款，營造出台灣社會處處有溫情的和諧感與向心力，台北市長郝龍斌就在 2011 年創世街友尾牙宴上鼓勵遊民「未來一年將是充滿希望溫暖的一年」（李桂馨，2011 年 1 月 26 日）。

遊民是尾牙宴上的第三種主要角色，也是媒體的訪問對象，包括參與尾牙的心情以及如何淪落為遊民的生平故事。參與的心情包括感激、開心、羞愧，甚至因為吃不到而放聲哭泣的難過。遊民的生平故事，往

往強調遊民處境的可憐無依，「尾牙宴邀請來的弱勢，許多都是需要社會長期關注的，一位 44 歲的單親媽媽，丈夫過世，獨自帶著四個月大的女兒借住朋友家，無固定收入，因要照顧女兒，難找工作，生活十分困苦」（李祖翔，2011 年 01 月 27 日）。

儘管相對犯罪類型報導，假日慈善報導傾向以同情正面的筆觸描述遊民，但既有研究亦指出這類強調可憐、慈善、憐憫的報導，卻也再度將遊民貼上「受害者」、「無救的」、「等待救濟的」的標籤，而弱化遊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Tipple & Speak, 2009）。同時，結構性的貧窮問題，在年節的家庭框架之下，被去政治化為私領域的議題，透過人際之間的照顧、人情、協商獲得解決。在強調溫情慈善的尾牙宴上，遊民沒有與政治人物以公民身分探討詰問貧窮問題的批判空間，而是以個別受助者的卑微姿態，領受政治人物以大家長身分給予的額外紅包祝福。Kendall（2005）亦指出，各界廣泛的善心捐助，讓社會大眾感覺社會上至少會有人出面解決這些問題，他們無需擔心或是沒有要求政治經濟改革解決問題的急迫性。

### 三、小結

遊民的新聞再現中，首先在二元對立的論述下，將遊民刻板化為對立於正常市民的不正常社會他者。而社會對不正常遊民的態度，則擺盪於敵視與同情的混雜情緒中。然而不管是敵視的犯罪嫌疑人，或是等待施捨的社會邊緣人，都因認定遊民為不正常，而剝奪其市民權，包括對公共空間的使用，而成為必須被規範、控制、監督、救濟的對象。

遊民公共空間使用權的被剝奪，在新聞論述中隱匿，成為無需質疑的理所當然。整套論述的前提是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掌控在權力機關，遊

民在公共空間的使用因為未獲權力機關授權，而成爲侵占、霸占，並導致公共空間的淪陷。同時這套論述，必須透過其他公共空間的所有者—其他市民，以檢舉者、不滿者、受害者的姿態出現，要求權力機關的介入管理，完成這套論述的合法性，賦予國家權力機關對公共空間使用的決定權與不需經過民主程序介入討論的壟斷權。遊民對空間的使用，被視爲侵入者，也因而往往成爲犯罪新聞中，警察、媒體與憤怒市民尋找的犯罪現場嫌疑人。這樣的控訴，只有在過年時節稍獲減免。相形「所有人」都回到溫暖的家，與家人歡欣團聚，遊民被形容爲或想像爲唯一不幸的群體，只能在年夜漂泊在黑暗的道路。

透過闔家團員與淒涼遊民的強烈對比，年節新聞報導再次強化資本主義與父權社會對理想社會和圓滿家庭的建構，並透過遊民作爲警示案例，告誡社會努力工作與成家的重要。是以，透過終年的懲罰追獵與年終的送暖，遊民被建構爲負面的社會存在份子，以此宣告「正常」的界線與維持「正常」社會家庭運作的必要性。

## 肆、雙重認同危機：自我否定與社會否定

資訊商品化下，遊民被貶抑爲汙名化商品，也因而造成雙重的認同危機（identification crisis）：社會不能認同遊民；遊民無法認同自身。認同包含兩種過程，一種是自我認同（identification of），我是誰，我和他人在情境裡的關係爲何；另一種是對他人或其他群體產生的認同（identification with），在情感上、心理上產生連帶感。

首先是遊民所見的遊民媒體再現，是一連串汙名化的形象，難以對遊民身分產生認同，甚至出現強烈的自我厭惡感。同時，汙名化的遊民形象，建構了正常市民與不正常遊民的二元對立結構，此對立結構在遊

民與其它市民之間製造強烈的敵意感、恐懼感與厭惡感，阻斷了社會成員與遊民之間認同連帶形成的可能。社會標籤對遊民的去人化，視其為社會的細菌敗類，滋生了對遊民無端嘲諷、辱罵、毆打的仇恨犯罪。根據美國 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 (2010) 的年度仇恨犯罪調查報告，自 1999 年開始，有上千起對遊民的攻擊，傷害至死者有 291 件，攻擊行為包括用球棒、高爾夫球棒毆人致死、強暴、潑汽油放火、丟擲石塊等。這些受害者承受的不只是身體的創傷，還有自尊受損的傷害。

根據台灣當代漂泊協會 2010 年針對台北車站遊民做的調查，30% 的遊民，露宿時曾遭受攻擊，19.3% 遭到言語攻擊，11.4% 曾被毆打，普遍對人身安全感到擔憂焦慮。

遊民大蜂就以自嘲口吻談遭受輕視嘲諷的難過：

流浪漢哦！幾乎你一失業，就會走上這條路。因為你一失業，好像你原本在高處，像是從 101 大樓，突然往下掉。但是，說真的，想當流浪漢，也不是件簡單的事。你最好是有待過服務業，就是當過小弟、小妹，習慣被人呼來喚去，可以忍受人家的白眼、嘲諷（受訪者大蜂，2008 年 8 月 10 日）。

阿義也提到被欺負的經驗使其自尊受到損害，

我覺得自己很悲賤。工作時，被大小聲，不能回嘴，要不然馬上被罵或被調走。睡在龍山公園，會被欺負，會被趕來趕去，有時候，還會被打」（受訪者阿義，2007 年 1 月 24 日）。

生活不穩定，工作沒保障，隨時遭受污辱與輕視，幾乎是每個遊民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與寫照。身處勞動力市場最底層，深受勞動彈性化影響，同時背負社會對於遊民的負面標籤。欲憑藉個人努力掙脫藩籬，

卻像是在迷宮中打轉，循環於失業、就業，有居所和無固定居所的日子。久了，將社會歧視內化為對自身的強烈否定，個人自我譴責，看不見生存希望。

作者在街頭訪談，遇到一位遊民阿孝，和他相識一段時間後，阿孝說：

跟你講，你跟我們不一樣。你是不斷想要說，明天是有希望的。但是，我們是覺得，沒有明天了。最好睡著了，就不要醒來，沒有明天最好。你能懂嗎？這個很深（受訪者阿孝，2007 年 5 月 1 日）。

在一旁的另一位遊民阿仁聽了，半開玩笑的說，「不用講這個啦！我可以唱給你聽...如果沒有明天」，阿孝很認真的說，「我是說真的，就是這樣」（受訪者阿孝、阿仁，2007 年 5 月 1 日）。

希望明天不要醒來，就這樣結束自己的人生，成為自己的希望。一位遊民小民在禱告時，當其他朋友問他，希望別人幫他祈禱什麼，他小聲的說，「回天家」（受訪者小民，2007 年 5 月 4 日）。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絕望感。面對生存的困境，感嘆人生的悲哀，生活的悲賤，最後沉默。Freire (Freire, 2001 / 顧建新、趙友華、何曙榮譯，2001，頁 41) 指出，「絕望是沉默的一種形式，是一種否定世界、逃避世界的形式」。這不僅是遊民面臨的問題，也是弱勢者普遍的處境。夏曉鵬 (2006) 也指出，打破沈默，開啓對話，形成對自身所處環境批判的認識觀的重要。

## 伍、打破沉默，對話空間的建立

在與遊民接觸歷程，每當遊民訴說著自己的生活遭遇與經歷，總不經意流露出對於生命的無奈、悲嘆與絕望。然而，在傾聽遊民分享的歷程中，卻又感受到遊民在「說出來」的過程，心情稍獲釋放。曾有一位遊民說到，「平常就是自己一個人，不會有人聽我講。現在，有人聽，講一講，心情比較好」。

2007年9月20日，第二作者因任職社工乙職，<sup>2</sup>開啓在機構每週舉辦公共論壇討論的機會，成立新聞討論會，希望透過輕鬆自由的討論環境，使每個遊民不再只是孤單沉默的個體，藉由新聞討論，分享工作生活點滴，表達自身意見，了解彼此處境，共同尋求解決困境的出路。

現在遊民最時興的工作就是街頭「舉牌」，一天三百元進帳，還有「呷好道相報」的遊民轉介其他遊民加入再「抽頭」。…目前市場上的「行情」，一天站八小時只有三百塊收入，雖然微薄，對遊民卻不無小補。…遊民一天的工錢，通常就買兩瓶米酒跟一個便當「剛剛好」（聯合報，2007.10.01: A2）。

這是2007年10月1日聯合報A2版的報導，標題為〈遊民也要工作—舉招牌 一天賺幾百〉。當天整版除了社論，其他全是與遊民相關的新聞報導。第一則〈台北車站兩個世界—貴婦變棄婦，夜夜巡查車站〉，在新聞版面最中間，斗大標題，加上一張台北車站零星幾個遊民睡覺，幾個遊民群聚打牌、喝酒、下棋的醒目照片，吸引閱聽人注意，也再次強化遊民是危險、製造社會問題者的負面印象。〈台北車站兩個世界—貴婦變棄婦，夜夜巡查車站〉報導，昔日陽明山豪宅貴婦，因罹

患腫瘤被丈夫遺棄淪為女遊民的新聞；同時還有一則〈榮民養小弟，威風三人行〉與〈討錢睡車站，雅房藏細姨〉的新聞，占據新聞二分之一版面。接下來是〈遊民也需要愛—摟流鶯，小旅館溫存〉，版面左邊則是〈現場晚點名—尬車給警追，午夜『遊』樂園〉。整版扣除社論，將近五分之四版面，新聞報導屬性相似度高，將遊民特殊化。每則新聞像是在報導奇人異事般，強化遊民是社會「異類」的刻板印象。

然而，卻是版面最角落的一則新聞，引爆了遊民們對主流媒體長期污名化報導的情緒。因為這則遊民當臨時工，在街頭舉牌八小時的報導錯誤連連。不僅將日曬雨淋，勞苦終日的 800 元薪資，錯誤的報導成 300 元，並暗示遊民們會將 300 元拿去買兩瓶米酒和一個便當，再次強化遊民為酗酒者的刻板印象。

從事舉招牌工作超過 1 年的阿祝在討論會上說，<sup>3</sup>「舉牌一天是 700~800 塊，沒有 300 塊的！」另一位正在從事舉牌工作的阿隆語帶生氣的說，「報紙這樣報導，其他派報公司看到，以為只要 300 塊，會把我們的工資降低」。阿貝說，「報導說，街友拿到錢就喝酒，也不正確。我就是不喝酒，打工賺來的錢，通常是我這星期的零用錢。不會拿到就花完」（2007 年 10 月 14 日）。

透過討論會的機制，讓做為資訊窮人的遊民，能夠閱讀報紙，交換分享一周的新聞消息，彌補資訊落後的處境。長久的沉默，也因為出現聆聽對象，而願意開口，說出心中的想法及分享自身的經驗。對於主流媒體大篇幅的污名化報導，烙上的社會標籤，如「精神病」（貴婦變棄婦）、「罪犯」（榮民養小弟）、「懶惰者」（討錢養細姨）、危害市民安全的脫軌者（尬車給警追）、「私生活不檢點的不道德者」（摟流鶯）、「酗酒者」（舉招牌），也因其報導方式過於聳動煽情，而感到離譜誇張。阿祝說：



「新聞報導的事情，感覺跟我們不太一樣。像是貴婦、榮民養小弟、遊民養小老婆，好像不常發生在我們身上，我自己也沒這經歷」，另一位阿隆也說，「對啊！還尬車給警察追，太誇張了」。

媒體對於遊民新聞報導不實，標籤化、放大化的負面報導，遊民並非沒有感受。只是過去遊民往往各自看見新聞，獨自承受新聞的負面報導。現在透過聚會集體討論新聞報導，說出對於新聞的看法與表達心情感受。

一位露宿台北車站將近十年的阿貝，提出他對於新聞媒體的觀察，

很少會登對我們街友關心的新聞，像是關心我們生活問題的。…幾乎都是報導街友犯罪，報導街友亂晃的事情（阿貝，2008年8月16日）。

同樣，露宿台北街頭，平常會到圖書館看報的小朋表示，

因為我現在是街友，白天只能去圖書館看一下報紙，電視就沒辦法看了。…新聞給我的感覺，好像是說，遊民好像很會製造問題，給社會大眾製造麻煩（小朋，2008年8月16日）。

遊民除了對誇張聳動的汙名化報導感到氣憤，也擔心舉牌薪資 800 元寫成 300 元的錯誤報導，將對工作產生影響。由於遊民是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者，只能聽任資方決定薪資，加上舉招牌的薪資也出現資方一路壓低，從一日 800 元，降到 750 元，甚至 700 元的情形。因此這份錯誤報導，加深了遊民的憂慮，恐懼雇主將因為媒體的報導，進一步壓低薪資。阿陸就說，

像那次 300 元的新聞，那時候坦白講，大家有一種義憤填膺的感覺，認為怎麼報導那麼少錢，明明不是這樣。如果因為這樣影響

到以後舉牌的薪水怎麼辦？（阿陸，2008 年 8 月 9 日）。

面對報導不符合實際工作狀況，又可能對於薪資造成影響，當時，筆者進一步詢問參與者，我們能夠怎麼辦？可以因應的方式？大多數參與者都希望能有傳遞實際狀況的機會。首先，有人建議，由第二作者來寫讀者投書。阿隆說，

你是社工，加上也了解我們的情況。你比較會寫，由你來寫，投到報紙，比較容易會上稿。這樣別人就知道街友有在工作，也可以把我們的心聲傳出去」。第二作者說，「讀者投書不見得會被刊登，尤其遊民新聞刊登率不高。即使刊登了，也是只有一天時效。

第二作者接著問大家，「除了這個方式以外，有沒有其他方式，是可以由我們一起參與的方法？」。我們陸續討論了幾種方式，例如共同書寫、攝影等。然而討論當下，許多遊民覺得過去沒有這些經驗且能力有限，要將這些想法付諸實現，似乎遙不可及。原本熱烈討論的氣氛也頓成膠著。

## 陸、漂泊新聞網（Homelessnews）

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數位落差深化了既有的壓迫結構，卻也辯證的提供新的反抗空間，使原本僵著的討論出現突破口。首先是公共電視公民新聞平台的創設，刺激我們原本的思考模式。過往對另類媒體的想像，主要停留在平面媒體，包括雜誌或是遊民報紙，但是這些方式，都必須有大量的資金投入以及具有寫作能力者的參與，對於物質困窘，嘗試自主發聲的遊民討論小組而言，可能性極低，討論也因此陷入僵局。但是公共電視公民新聞平台（PeoPo）的創設，刺激我們以影像作為發聲媒

體的可行性。儘管小組當中沒有任何人熟悉影像製作，但當前影像製作的門檻大幅降低，提供嘗試的契機。

在 2007 年 10 月 11 日新聞討論會時，作者跟大家介紹公共電視公民新聞平台，提出我們可以嘗試以此做為發聲管道。儘管沒有任何影像製作的經驗、沒有信心、沒有經費、沒有器材，但卻不妨礙想像的自由，特別是討論網站名稱時氣氛熱烈，紛紛提出各種想法，如「流浪電視台」、「流浪追追追」、「街友新聞台」、「漂泊新聞網」等，也因此激發了嘗試的勇氣。

於是在作者借到攝影機，有朋友願意教導影像製作技巧後，開始嘗試這項計畫。首先目標是紀錄遊民舉牌工作的狀況，以反駁主流媒體的錯誤報導。這則「街友舉牌實錄」，片長 5 分 20 秒，片頭由包含遊民和社工的小組成員，一起站在簡陋，只有黑板作佈景，除濕機充當主播檯的新聞室，共同念出台呼，「街友的心聲，盡在漂泊新聞網」。接著由第二作者擔任棚內主播，介紹新聞事件的背景，某大報對遊民舉牌薪資 300 元的報導，引起遊民的憤怒與擔憂，因此將透過實際採訪了解街友舉牌的實際薪資與待遇。畫面接著轉向外景，天剛亮的台北街頭，一群人在未開店的騎樓下等待派報公司的車子，自此開始記錄遊民一整天的舉牌工作過程。集合聆聽派報公司的指示，被送往各個街頭舉牌，勉強在強風中豎起牌子，匆忙解決午餐以及深夜搭乘公車返回休息地。舉招牌是台北近年主要的臨時工項目，也是醒目的街景，但卻少有報導，這則新聞首度呈現舉招牌工的勞動過程。新聞的第二部分，是針對主流媒體的錯誤報導，由遊民模仿外線記者訪問其他遊民。同是遊民，且彼此相識，受訪者較願意直率的表達想法，甚至提供自己的薪資內容。對於錯誤的報導，則表示「黑白講（亂說）」、「沒有這樣的事情」、「不要剝奪我們的權益」。

過往影像製作完成之後的發布、傳輸、映演以及獲得觀眾的回應，是一個複雜且困難度高的過程。但是透過網路及公民新聞平台，影像製作完成之後，可以輕易的上傳，也跨越地理空間、時間的限制，將訊息傳佈給不同的社會團體（Fountain, 2007）。在公民新聞平台上，新聞討論小組架設了「漂泊新聞網（Homelessnews）」，希望藉此傳達遊民的聲音，改變大眾對遊民的刻板印象。

Schmitz（1997）指出相較傳統的媒體，電子媒體具有滲透既有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ies）與傳統社團的潛能，特別讓原本因社會偏見而被屏障的訊息，獲得穿越的機會。例如社會對遊民大多持有負面的刻板印象，很難透過人際面對面溝通，取得和大眾對話的可能，但是電子媒體降低了既有的屏障效果。「街友舉牌實錄」在 2007 年 10 月 28 日上傳到漂泊新聞網後，獲得許多社會大眾的回應與鼓勵。這些回應，基本上可以分為五大類。<sup>4</sup> 第一類是鼓勵類；第二類是表達對遊民刻板印象的改變；第三類是對漂泊新聞網報導形式的意見；第四類是提出聲援與資源支持的意願；第五類是與其他遊民相關的訊息。

鼓勵類：

「加油 幹的好啊。支持你們。好屌」（黑狗陳，2007 年 10 月 30 日）

「真是太讚了…期待下一則報導喔~~」（台北阿玲，2007 年 10 月 29 日）

社會對遊民的觀感改變：

「靠自己的努力生存，對街友的看法大大改觀，加油喔。」  
（tt，2007 年 10 月 28 日）

報導形式：

「讚啦！街友終於有自己發聲的管道，看了這則報導，不禁感到有點嘆息，但看了報導方式與主播、連線記者，也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加油！希望持續看到你們的報導！」（楊佛頭，2007年10月31日）

「外場連線記者陳先生，真的太讚了，我覺得你的表現，不論聲調還是投入的感情，都是絕對最佳的外場記者。當然，主播的表現也很棒，如果可以，下次可以把稿子放在鏡頭前講，這樣看起來會模擬的更像喔。」（jlarkin，2007年10月29日）

「推！好棒的新聞，題材新鮮，在剪輯與採訪取樣也不錯」（哩良，2007年10月30日）

聲援與支持：

「舉牌為了生活，希望大家給他們掌聲！再有人無端傷人，就到他們家門口舉牌！」（單車小賢，2007年10月28日）

「衣食無缺的我……又不禁反省了起來……加油!!!

希望你們可以改變社會大眾對於遊民的誤解~身邊幾乎所有的人都覺得遊民好可怕~

有開放捐款嗎？看到新聞說你們缺電腦~身為學生的我是沒辦法送台電腦~不過資助點小錢到還 OK~」（我是明新科技大學的學生~加油!!我挺你們，2007年10月30日）

與其他遊民串連：

「屏東也有許多遊民需要要關心。能加入您們的陣容嗎？」

(小尾, 2007 年 10 月 28 日)

新聞討論會上, 參與者看著一則則在公民新聞平台上的迴響。阿貝念著留言, 眼淚也從旁落下來。阿貝說, 「很感動! 我們可以做出來, 讓社會聽見我們的聲音」。阿陸表示, 「就是我們講話, 人家會聽。有管道, 能夠讓人家聽, 而且有正面回應」(2007 年 11 月 5 日)。外界的迴響, 產生很大的鼓舞, 也讓遊民可以直接與社會大眾建立對話。爲了感謝外界的鼓勵支持, 漂泊新聞網接著製作兩支影片「《漂泊新聞網》謝謝大家支持」、「《漂泊新聞網》幕後花絮」, 將幕後製作的過程, 與外界分享。外界的鼓勵, 形成繼續努力的動力, 也由於信心增添, 感覺有趣, 遊民也開始輪流坐上主播檯, 繼續製作強調自遊民觀點出發的影音新聞, 包括「禦寒寶典」、「漂泊郎話政治」等, 平衡主流社會對遊民的刻板印象。

儘管漂泊新聞網的推出, 獲得社會的正面評價與鼓勵, 然而影像製作對成員而言依舊是高難度的另類媒體類型, 主要原因分成三個方面:

## 一、影像製作能力

目前參與的遊民以中老年人爲主, 普遍對傳播科技非常陌生, 很難通過學習, 成爲影像工作者。至於當代漂泊其他非遊民的成員, 也大多沒有正式學習影像製作的技巧, 必須透過自學摸索。儘管另類媒體的一大特性是通過自學與集體的實驗創新, 對專業主義與正式教育體系的嚴格階層與僵硬的符號表現進行挑戰, 發展非正式的技术與另類文化, 解放除魅所謂的正規文化 (legitimate culture) (Atton, 2002)。但在學習過程中, 作爲非影像專業者, 也不是另類媒體的專職人員, 在時間不足、資源缺乏下, 學習上顯得吃力, 製作速度也十分緩慢。

## 二、影像製作設備

作為新生獨立的團體，沒有資金購置攝影設備，同時參與的對象為赤貧的遊民，成員無力集資，經濟的極端困窘，使得攝影裝備必須依靠朋友商借或是外界捐贈。但攝影器材屬於高單價物品，不易取得。同時，借自他人的攝影機，也必須謹慎使用。兼之遊民的家當力求簡便，物品時遭沒收丟棄，也影響遊民攜帶攝影機的可能性。資源的極端困窘以及遊民的環境限制，嚴重限制內部成員使用與學習攝影機的機會。

## 三、影像觀看設備

另一項主要困難是影像製作上傳完成之後，如何讓成員觀看作品。由於目前少有地方可以讓遊民自由使用電腦和網路，因此在觀看上，必須借用社會團體的辦公室，讓大家看到作品。觀看會上不僅看到自己的身影，感到害羞開心，也看到一種集體性的呈現。由於有些遊民是文盲，必須透過朗讀，使其知曉觀眾的迴響為何，這段將網路訊息轉化為公開朗誦的過程，具象的說明遊民與社會外界對話管道的建立。對遊民而言，「社會大眾」有了新的形象，不再只是厭惡遊民的人或是同情者，更有可能是理解對話的支持者。但除了部分住在網咖的遊民之外，其他遊民成員缺乏網路的近用，無法隨時觀看以及獨立留言回覆，也是網路作為遊民另類媒體的主要侷限。

這些限制反映出網路與資訊科技在社會應用上的複雜性，故此在理解數位落差問題時，不能只看家戶網路普及率的統計數字，還必須看使用者的使用過程以及使用目的。同時，這些限制都與遊民的弱勢身分緊

密相關，因此在考察資訊科技的使用時，必須同時觀照使用者的社會身分、政治經濟資源以及遭受的政策對待。例如政府對遊民生活物品採取沒收丟棄的政策，就嚴重影響遊民攜帶資訊科技產品的可能。缺乏地方人士可以自由使用的資訊中心，也使遊民很難近用網路，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本的匱乏，更加重遊民對傳播科技使用的障礙。

要克服這些障礙，必須發展不同的策略，以人力彌補資訊落差，讓弱勢群體在不利處境中獲得資訊，發展另類媒體。例如讀報會的機制，需要帶領活動者，事先蒐集報紙與電子新聞，提供給遊民在會上閱讀與觀看，在足夠資訊的基礎上，表達看法、交換意見。影像製作過程中，不強調影像製作的技術與精美，將影像後製的比重壓低，以表達想法、傳達訊息為主，口語不需清晰，重點在於遊民可以自在表達意見。影像觀看會的設計，是爲了彌補遊民無法自由使用網路的限制。透過朗誦的方式，讓不識字者也可以看到網民的回應，從而表達自己的想法，給予回應。亦即弱勢者目前的數位落差，必須透過不同機制的設計，投入大量的人力，才能彌補不足的資訊，參與另類媒體的製作。Gaved 與 Mulholland（2010）指出，克服數位落差時，不僅是硬體設備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的影響。認爲最有效且最能持久發展網路使用的方式，是來自當地草根社團（grassroots networked communities）的支援，這個支援系統來自當地，具有地理上的親近性，同時與當地的社會關係緊密嵌合。

發展在地草根社團，成爲克服數位落差的重要機制，而當中也有賴熟悉弱勢者生活，並且願意站在弱勢群體的利益一起努力的行動者。資訊社會的發展，使得大量接觸社會弱勢者的社工，也面臨新的挑戰，必須同時解決其個案的資訊窮人困境（McNutt & Hick, 2002）。Steyaert 與 Gould（2009）主張社工應該改變過往對資訊科技的疏離態度，積極



加入對抗數位落差的前線。除了社工之外，大量接觸弱勢者的，尚有體制外的社會運動者，鑒於資訊科技在當代社會的重要影響，以及媒體科技使用門檻的降低，發展另類媒體，也成為近年台灣社會運動者的新興運動策略。例如以移工權益為訴求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在 2007 年出版《凝視驛鄉》攝影集，2010 年完成紀錄片【T 婆工廠】。以遊民與工作窮人權益維護為旨的當代漂泊，在 2008 年成立遊民攝影班，連續四年舉辦攝影展，在 2010 年出版《底層流動／流浪的視界》攝影集以及在 2011 年出版《製造流浪》攝影集。以新移民／移工權利維護為訴求的南洋台灣姊妹會，在 2009 年成立南洋姊妹劇團，2010 年完成紀錄片【姊妹，賣冬瓜！】。

相較於社會通常將移工、新移民與遊民定位為沒有主體發言權利之無聲者，上述團體以攝影集、攝影展、劇場及紀錄片等文化行動方式，由移工、新移民、遊民作為發聲主體，以翻轉社會與主流媒體加諸於弱勢者的污名標籤（成露茜，2009；李芝瑩，2009；周憶如，2010；張正，2008；郭盈靖，2009），弱勢者在自我表述的歷程中，自身產生轉變，例如增進自信、勇氣，也促進相互認識與理解。然而，此一歷程是一項長期工作，絕非輕而易舉，因為弱勢者在長期必須服從與受支配的生活之中，往往漸失表述自己的能力，「我認為」、「我想要」的表述方式，對於他們來說十分陌生（黃國治，2007）。

此外，如何在文化行動中鑲入議題，也是一項重要挑戰。周憶如（周憶如，2010，頁 13）指出，「『表演』是眾多文化行動的一種，要如何讓姊妹在前階段體驗並深化生命經驗於意識表達，則必須再做議題與個人參與重要的轉碼」。李芝瑩（2009）指出移工攝影作品的核心關切不在影像而在伸張移工權益。同樣的，遊民攝影展除呈現遊民的處境外，亦透過展覽主題的安排企圖引導社會對話的方向，如 2010 年的

居無定所攝影展，即企圖重新框架遊民議題，反思過往個人責備論的傾向，看見製造貧窮的結構性因素與遊民／工作窮人兩種身分之間的重疊與擺盪（戴瑜慧，2011）。

新移民／工另類媒體實踐者張正指出，文化不只是文化，而是文化鬥爭，藉由「文化」進行鬥爭，弱勢發出聲音，取得詮釋權，進而影響既有的文化霸權。而所謂的文化鬥爭包含「凝聚力量、組織人民、改善處境」（張正，2008，頁 13）。亦即，在文化行動的場域裡，不論採取何種方式，諸如攝影、戲劇、紀錄片等，「組織工作」是重要且必需的。因此組織對象的特性與處境深刻影響其另類媒體的型態與樣貌。誠如成露茜（2009）指出台灣新移民與移工另類媒體的萌芽與政府當局的多元文化主義意識型態、足夠的閱讀人口支撐廣告市場以及志工群的投入緊密相關。在這樣的結構背景下，加上草根團體的長期紮根經營，文化行動與組織工作相輔相成，已然有相當紮實的基礎。同樣的結構對比遊民領域，右翼驅趕打壓的政策主張不斷高漲，遊民群體不足以形成以自身為對象的讀者市場。同時，遊民的高度流動性與薄弱的社經教育資源亦阻礙穩定志工群的形成。以不同群體為組織對象的另類媒體，也因此在誕生的時刻即被烙上各自特有的性質，進行比較研究實為另類媒體研究的另一重要發展領域，唯篇幅與能力所限，無法在此文細緻開展。

## 柒、結論

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資訊社會論述的高舉，改變資訊環境的生態，也對弱勢族群的處境產生衝擊。台灣遊民長年被社會整體系統性的邊緣化，此種邊緣處境，在國家高舉資訊社會，推動資訊商品化下，面臨更深刻的壓迫與雙重歧視：一是被物化為刺激收視的「汙名化商

品」；一是資訊氾濫年代下被排除的「資訊窮人」。

資訊社會下，資訊的流散與獲取，深刻的影響個人教育、工作、健康照護等基本人權，也因此改變當代基本公民權的概念。Murdock（1999）就主張在既有的經濟權，社會權，與政治權外，加入文化權（cultural rights）的概念。公民基本權利乃是能夠有尊嚴地、全面地參與社會生活，而其前提是必須保障每個人平等接近使用物質與符號資源的機會。

數位落差自 1990 年代中期以後成為重要的社會議題，各國政府以提高家戶網路普及度作為因應對策。然而，以家戶網路普及度作為消弭數位落差的政策手段，過度簡化社會應用資訊的複雜性，也過度樂觀的相信科技的改變能力。Atton（2004）對科技樂觀主義提出警告，指出科技本身就是特定政治經濟結構下的產物，所謂的科技「進步」也是根據特定社會菁英（企業、政府）的利益定義型塑的結果。因此盲目的抱持科技樂觀主義，將會忽視現實生活中的權力關係，以及各種弱化社會群體主體性的現實障礙，例如法律環境，數位落差與不同群體之間文化資本的差距。

資訊科技的硬體提供，不代表弱勢群體就有能力直接運用資訊科技，Steyaert（2002）指出就算弱勢者獲得網路設備的近用，也依舊無法消弭數位差距，必須有倡權團體與社會運動，實質的增進弱勢群體使用資訊與科技的能力，才有可能消除科技隔離（technology apartheid）。

Murdock（1999）也特別指出要保障文化公民權，必須實現四項基本權利：資訊權、經驗權、知識權、參與權。其中參與權意指，

公民有權翻轉不對等的傳播權力關係，不再只是被動閱聽眾的角色，而是有權發聲，讓自己的生活處境和實際想法被社會其他人

聽見，並且有權參與公共議題及公共決策（Murdock, 1999, p. 12）。

儘管資訊科技的發展，帶來新的壓迫型態，但也辯證的提供新型的反抗空間，為弱勢群體發展另類媒體，實現自我發聲提供可能。特別是影像製作技術的日趨簡化，資本投入門檻的降低以及網路的流通，為另類媒體的發展提供結構上的可能，也成為社會運動的新發展策略。2007 年開展的遊民另類媒體實踐，是奠基在對過往經驗的反省，提出的新策略與主張。主流媒體長期的汙名化報導，以及深重的社會標籤，使遊民往往被視為不工作的懶惰者，工作窮人的身分不被承認，因此在爭取遊民權益時，運動的正當性時遭質疑。遊民另類媒體的建立，是遊民權益運動另闢蹊徑的新嘗試，認為一個在經濟與文化領域都遭受雙重歧視的弱勢群體，唯有同時爭取與社會大眾對話，改變既有的社會歧視，才有可能獲得話語權與正當性，因此必須同步開展經濟公民權與文化公民權的爭取。

台灣遊民另類媒體的實踐經驗也指出，資訊科技與數位科技的發展降低弱勢者發展另類媒體的技術資本門檻，非專業者也可透過自學成為影像創作者。但是，弱勢群體的社會處境，政治經濟資源依舊深刻的影響另類媒體發展的樣貌與發展潛能。例如台灣政府對遊民採取驅趕政策，經常性的沒收丟棄遊民家當，阻礙遊民攜帶傳播設備的可能。同時缺乏在地的公共資訊中心，也使得遊民或是城市貧民，很難近用網路科技。本文建議數位落差的消弭，必須改變既有的科技決定論思維，在普及網路硬體設施時，亦應鼓勵發展在地草根社團，以積極的方式協助弱勢者有機的使用資訊科技。另類媒體是有效賦權（empower）弱勢者的文化手段，提升自我認同，增進資訊獲得、挑戰社會標籤以及促進社會對話。但弱勢者另類媒體的發展卻受限於主體的政經位置，因此本文建

議必須採取更積極有效的手段，改變弱勢者的社會處境，方能釋放弱勢者投入另類媒體的潛能，實現多元的社會風貌。

## 註釋

- 1 阿寶 45 年次，2009 年曾因中風住院，2010 年左腿骨折，加上長年餐風露宿，身體已無法負荷體力型勞動，2010 年至醫院就診時，醫生也表示，腿部因傷，已不適合從事久站或需要長期走路的工作。
- 2 具有社會運動參與經驗的社工郭盈靖，在協助遊民處理勞資爭議以及在遊民團體演講介紹勞動權益與法令時，認為有組織遊民新聞討論群組的必要，以透過集體討論與認識權益改善遊民在勞動市場上的弱勢處境。2007 年在任職的基督教救世軍街友中心成立新聞討論群組，與遊民一起閱讀報紙討論新聞。
- 3 第 147 頁至 148 頁有關數位遊民之引句均出自本文第二作者在新聞討論會之記錄，發言者均為化名。
- 4 第 150 至 152 頁所引均出自漂泊新聞網之網民留言，參見：  
<http://www.peopo.org/portal.php?op=viewPost&articleId=7909>。

## 參考文獻

- 〈這個年 街友怎麼過？〉（2005 年 02 月 07 日）。《民生報》，第 A3 版。
- 〈鋪蓋游擊，遊民趕又回〉（2007 年 08 月 12 日）。《聯合晚報》，第 5 版。
- 〈舉招牌一天賺幾百〉（2007 年 10 月 01 日）。《聯合報》，第 A2 版。
- 〈建國公園變貌，占椅睡覺仍在〉（2007 年 10 月 26 日）。《聯合報》，第 C1 版。
- 〈永平國宅閒置，遊民吸膠打鬥〉。（2007 年 11 月 01 日）。《聯合報》，第 C1 版。
- 〈金門新城 爆遊民性侵女童案〉（2007 年 11 月 07 日）。《聯合報》，第 C2 版。
- 〈報廢宿舍，遊民毒蟲出沒〉。（2007 年 12 月 05 日）。《聯合報》，第 C2 版。
- 台灣當代漂泊協會（2011 年 1 月 24 日）。〈工作窮人與遊民一線間—台北車站遊民調查報告〉。取自 <http://homelessoftaiwan.pixnet.net/blog/post/26088713>
- 成露茜（2006）。〈移民／工與發聲媒體〉，夏曉鵬（編），《跨界流離：全球化

- 下的移民與移工》，頁 129-158。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 行政院（2010 年 11 月 25 日）。〈吳院長聽取「愛台 12 建設—智慧台灣推動成效」報告案〉。取自 行政院新聞局網頁  
<http://www.ey.gov.tw/ct.asp?xItem=75329&ctNode=1435>
- 李芝瑩（2009）。〈外籍移工攝影作品中的社會批判分析：以《凝視驛鄉 VOYAGE15840》為例〉，《社會科教育研究》，14: 277-292。
- 李祖翹（2011 年 01 月 27 日）。〈街友尾牙宴 50 元成就美事〉，《人間福報》。  
取自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216195>
- 李桂馨（2011 年 01 月 26 日）。〈100 年街友尾牙上菜 蕭萬長郝龍斌發紅包〉，《自立晚報》。取自  
[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catid=4&catsid=2&catdid=0&artid=20110126guisin008](http://www.idn.com.tw/news/news_content.php?catid=4&catsid=2&catdid=0&artid=20110126guisin008)
- 季欣麟（1998）。〈陳水扁：校校有網路，班班有電腦〉，《遠見雜誌》，147: 33-45。
- 周憶如（2010）。〈南洋姊妹要說戲：當組織工作搭載文化行動〉，取自  
<http://tasat.blogspot.com/search/label/%E5%8D%97%E6%B4%8B%E5%A7%8A%E5%A6%B9%E5%8A%87%E5%9C%98>
- 夏曉鵬（2006）。〈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差異政治、主體化與社會性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 1-71。
- 陳明輝（2010）。〈The Big Issue！社會企業的核心價值與創新商業模式〉，《創業管理研究》，5(2): 83-110。
- 張正（2008）。《全球化之下新移民／工社群的跨界文化鬥爭》。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勵德、蔡智銘（2011 年 01 月 27 日）。〈街友尾牙席開 2500 桌，21 年最大規模，6 千善心人贊助〉，《蘋果日報》。取自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127/143/2liy8.html>。
- 郭盈靖（2009）。《看不見的勞動者—台灣遊民勞動權益剝奪的意識形態與建制分析》。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項程鎮（2010 年 09 月 25 日）。〈亂棒毆死街友 超商店長判 10 年〉，《自由時報》。取自 <http://n.yam.com/tlt/society/201009/20100925741663.html>
- 馮惠宜（2011 年 01 月 12 日）。〈8 旬孀孀桌 街友尾牙宴呷澎澎〉，《中時電子報》。取自 <http://news.chinatimes.com/domestic/11050610/112011011200160.html>
- 顧建新、趙友華、何曙榮譯（2001）。《被壓迫者教育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 Paulo Freire [200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NY: Continuum）
- 黃國治（2007）。〈讓我們互相看見—移工攝影集《凝視驛鄉》〉，《台灣光

- 華》, 32: 52-56。
- 戴瑜慧 (2011)。〈「台北寄居蟹—2010 居無定所攝影展」影像紀要〉,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5: 353-376。
- Atton, C. (2002). *Alternative media*. London, UK: SAGE.
- Blair, T. (2004, 09, 28). The opportunity society: Speech by Tony Blair, Prime Minister and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Labour Party Annual Conference. Retrieved from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politics/3697434.stm](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politics/3697434.stm).
- Boyle, J. (1996). *Shamans, software, & spleens: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no, G., Esposito, E., Genovese, A., & Gwebu, K. L. (2011).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urrent indexes for digital divide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Society*, 27, 16-28.
- Carey, J., & Quirk, J. (1989). The mythos of 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 In J. Carey (Eds.).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pp. 113-141). New York, NY: Routledge.
- Feather, J. (1998).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study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UK: Library Association.
- Fountain, A. (2007). Alternative film, video and television 1965-2005. K. Coyer, T. Downum & A. Fountain (Eds.). *The alternative media handbook* (pp. 29-46). Oxford, UK: Routledge.
- Gaved, M. B., & Mulholland, P. (2010). Network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bottom up: Grassroots approaches to overcoming the digital divide. *AI & Society*, 25(3), 345-357.
- Gillett, S. E. (2000). Universal service: Defining the policy goal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Society*, 16(2), 147-149.
- Hersberger, J. (2002). Are the economically poor information poor? Does the digital divide affect the homeless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Library Sciences*, 27(3), 45-63.
- Hersberger, J. (2005). The homeless and information needs and services. *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Quarterly*, 44(3), 199-202.
- Hilbert, M. (2011). Digital gender divide or technologically empowered wo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ypical case of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4(6), 479-489.
- Howard, P. N., Busch, L., & Sheets, P. (2010). Internet access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1), 109-128.
- Kendall, D. E. (2005). *Framing clas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wealth and poverty in Americ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Khan, F., & Ghadially, R. (2010). Empowerment through ICT education, access and use: A gender analysis of Muslim youth in Ind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2(5), 659-673.

- Leadbeater, C. (1997). *Living on thin air: The new economy*. London, UK: Penguin.
- Levinson, D., & Ross, M. (2007). *Homelessness handbook*. Great Barrington, MA.: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
- Lind, R. A., & Danowski, A. (1999).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homeless in U.S. electronic media: A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 analysis. In E. Min. (Ed.). *Reading the homeless: The media's image of homeless culture* (pp. 109-120).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 Livingstone, S. (2007). Youthful expert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children's emerging internet literacy. In Robin M., Chrisarhi A., Danny Q., & Roger, S. (Eds.), *Oxford handbook on ICTs*. (p. 494).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y, C. (2002).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sceptical view*.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McNulty, B. R. (1992). *Homeless and hopeless: Resignation in news media constructions of homelessness as a social proble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McNutt, J. G., & Hick, S. (2002). *Cyberadvocacy as social work practice. Advocacy, activism, and the Internet: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 Chicago, IL: Lyceum Books.
- Mansell, R., & Steinmueller, W. (2000). *Mobiliz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Strategies for growth and opportun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strovic, M. (1994). The socialit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civility of society. In S. Splichal, A. Calabrese, & C. Sparks, (Eds.).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 Mosco, V. (1994). Telecommunications for a democratic public sphere: The case of Canada. In S. Splichal, A. Calabrese, & C. Sparks (Eds.).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 Murdock, G. (1999). Rights and representations: Public discourse and cultural citizenship. *Television and Common Knowledge*, 7, 7-17.
- 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 (2010). Hate crimes against the homel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ationalhomeless.org/factsheets/hatecrimes.html>.
- Parayil, G. (2005).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ncreasing returns: Contradictions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Information Society*, 21, 41-51.
- Passaro, J. (1996). *The unequal homeless: Men on the streets, women in their place*.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ice, R. (2002). Primary issues in Internet use: Access, civic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xpression. In L. Lievrouw & S. Livingstone (Eds.). *Handbook of new media: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London, UK: Sage.
- Ronald, S. (1995). The emerging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the information poor. *APLIS*,



8(1), 337-347.

- Schmitz, J. (1997). Structural relations, electronic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The public electronic network and the homeless. In S. Jones (Eds.). *Virtual culture: Ident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cybersociety*. London, UK: Sage.
- Servon, L. (2002).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Technology, community and public policy*. London, UK: Blackwell.
- Siobhan, S. (2009). Digital divide: A discursive move away from the real inequities. *Information Society*, 25, 1-22.
- Steyaert, J. (2002). Inequality and the digital divide: Myths and realities. In S. Hick & J. McNutt (Eds.). *Advocacy, activism, and the internet: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 Chicago, IL: Lycecum Books.
- Steyaert, J., & Gould, N. (2009). Social work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digital divid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9(4), 740-753.
- Tipple, G., & Speak, S. (2009). *The hidden millions: Homelessn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UK: Routledge.
- Tsatsou, P. (2011). Digital divides revisited: What is new about divides and their research? *Media Culture Society*, 33, 317-330.
- van Dijk, J. (1999). *The network society: Social aspects of new media*. London, UK: Sage.
- Whang, I. S. (1993). *A structuralistic narrative analysis of television evening news coverage of the homeless, 1985-1991*.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Wong, Y. C., Fung, J., Law, C. K., Lam, J., & Lee, V. (2009). Tackling the digital divid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9, 754-767.
- Wright, T. (1997). *Out of place: Homeless mobilizations, subcities, and contested landscap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附錄：

本研究訪談期間為 2005 年至 2008 年，針對 13 位遊民進行長期的田野觀察與深度訪談，透過頻繁的生活接觸，觀察其生活工作狀態，訪談方式包括經常性的對話以及比較正式的一對一訪談。

訪談內容採開放式問題，訪談綱要如下：

1. 受訪者基本資料（姓名、年齡、學歷、健康狀況）
2. 露宿街頭的原因與背景
3. 曾經露宿的地點、時間以及在不同地點轉換的原因
4. 在遊民身分以及脫離遊民身分之間的轉折  
（次數，年份，脫離街頭的原因以及又成爲遊民的原因？）
5. 曾經從事的工作以及目前從事的工作？  
（工作類型、待遇、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經歷過的勞資糾紛、求職的過程、離職的原因、對身體的影響、是否受到職業傷害、工作過程的心得）
6. 平時去哪些社會福利機構？選擇的時間？接受的服務項目？

#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Minority Groups’ Cultural Rights: The Emergence of Alternative Homeless Media in Taiwan

Yuhui Tai, Yingching Kuo\*

##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cultural rights of minority groups. First,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nformation commodification have resulted in novel forms of the suppression of minority groups. Homeless people not only suffer from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xclusion, but experience cultural deprivation, are demeaned as being “information poor,” and are dehumanized as stigmatized commodities. Second, the government uses household Internet accessibility as an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digital divide, ignoring homeless people and systematically excluding them from support policie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romotion of citizen journalism have lowered the barriers for minority groups to develop alternative media and have created a novel space of resistance.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emergence of homeless alternative media in Taiwa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insufficient and that

---

\* Yuhui Tai,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Art Ph.D. Candidate.  
Yingching Kuo, Salvation Army Taiwan social worker. Homeless of Taiwan Executive Member.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grassroots, networked communities to help homeless people obtain information,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become alternative media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content, format, distribution, audience responses, and obstacles of homeless alternative media and argues that homeless people's social position must be improved to fulfill the potential of homeless alternative media.

**Keywords:** Alternative media, citizen journalism, citizenship, digital divide, homeless, information society